黄 钟 瑞

刘拴韵 姜平贺

黄钟瑞，又名黄凝晖，河北省晋州市（原晋县）祁底村人。生于 1902 年 10 月，1923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唐山地委组织部长、书记，中共天津市河北区委书记等职。1931 年脱党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1980 年病逝于天津。

一

1910 年，黄钟瑞在晋县相邱村私立高级小学启蒙，1919 年考入正定省立第七中学。1923 年中学毕业后，升入保定直隶二师高级班，1925 年暑期毕业。

黄钟瑞自幼聪慧，勤奋好学，各科功课均优。受老师樊树勋的影响，少年时代即关心国事。张勋复辟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当时，年仅 15 岁的黄钟瑞，便邀集了一帮小同学，对此事展开讨论，并画了好多漫画张贴到县城。漫画上“辫子军”的丑陋形象，使观看群众捧腹大笑，乐不可支。1918 年，新文化运动也影响到农村，就文言文和白话文，黄钟瑞多次和一些同学争辩孰优孰劣的问题，他说：写文章是让人们看的，文言文有多少人能看懂呢，还是白话文好。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在老师樊树勋的组织下，学生们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黄钟瑞用毛笔写下过这样一句话：中国要富强，亦须废帝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大概是幼年丧母之故，黄钟瑞的性格趋于内向，单独一人时，总是一副沉思默想的神态，在人前也显得老成持重，与他的年龄不大相符。

黄钟瑞慷慨大方，乐于助人的品德尤为人称道。1920 年，他在正定七中读书期间，家乡的几个小同学也前去报考七中，他把几天里的食宿都包了下来。晚上，他忍受着蚊虫叮咬睡在屋外，而把床铺、蚊帐让给几个小同学。考试结束后，他担心几个小同学的安全，从正定徒步送他们回晋县。过滹沱河，水深流急，他往返几次，把他们一一背到对岸。

五四运动发生之后，反帝、反封建的热潮激荡着全国。同时，也冲开了黄钟瑞宁静的心扉。和许多青年一样，他贪婪地阅读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书刊。《独 秀文存》、《向导》、《新 青年》等进步书刊，使他心胸开阔，认识到中华民族要自立、自强，兴盛于天下，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必须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从这个时候起，他对社会主义即产生了一种朦胧的向往。1923 年 5 月，正定七中学生召开“五七”雪耻大会，强烈要求北洋军阀政府抗击日军，收回旅顺、大连，取消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明伦堂上，黄钟瑞慷慨激昂的演讲，博得了阵阵掌声。讲到动情处，他慨然下跪，使在场者无不动容，义愤填胸。

1923 年 7 月,黄钟瑞考入保定直隶第二师范学校(即男二师）。京畿之地保定是中国北方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教育事业发展较早。直隶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直隶高等农业专科学校、直隶第二师范、直隶第二女子师范、育德中学等都是在中国北方有重要影响的学校。众多的高等学堂集中了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加之保定距北平、天津较近，政治、文化生活等方面多受其影响，所以 早在“五四”之前，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就已经波及保定。“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在保定蓬勃兴起，科学和民主的新思潮广为传播。邓中夏、何孟雄、王森然等一些早期共产主义者相继到

保定任教，更加速了新文化运动的向前发展。他们的革命活动，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保定的传播，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他们的教诲和影响下，一大批政治上敏感，富于进取心的青年学生，在风起云涌的历史潮流中，辨清识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为以后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黄钟瑞在二师，时时感到有一种新的生活气息在吸引着他。从《新青年》、《少年中国》、《共产党宣言》中，他对共产主义新思想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思想上、理论上提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当结识了刘承皓、张廷瑞、张辅堂等一批进步青年后，他更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他们经常在一起参加“社会问题研究会”和“读书会”的研究讨论活动，对马列主义、社会现实以及如何改造社会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一帮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在一块儿指点江山，评论时事，大有一种“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豪迈气概”。不久，黄钟瑞便加入了保定二师社会主义青年团。以更高的热情投入到校内外各种反帝反封建活动中。

1923 年 11 月，保定女二师爆发了“剪发斗争”。该校第七班张文卓、王佩珊、韩玉蓉等 5 个女学生，冲破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剪掉盘于脑后的发髻而改成齐耳短发。校方当局发现后大为震惊，惊呼：这是女二师校史上空前的“大逆不道”行为。当即贴出布告，以“违反校规、有伤风化”为由，将这 5 名女学生开除校籍。校方的做法激起了学生们的强烈不满， 5 名女学生的所在班首先罢课，以示抗议，其它各班的学生们也议论纷纷。但是，校方无视学生们的抗议，顽固坚持开除校籍的处理决定。消息传到男二师后，不少进步学生对女二师封建卫道士的行为也感到非常气愤，对被开除的 5 名女学生深表同情。黄钟瑞、张廷瑞、张辅堂等几个男同学挺身而出，一边组织本校学生声援，一边赶到女二师发动其它班女学生同校方进行说理斗争，并酝酿罢课。全

校性的学潮一触即发。在此情况下，女二师校方为了稳定局势，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不得不收回开除令，改为给已剪发的女学生以记过处分。

剪发斗争的胜利，是女二师学生公开反对校方的第一个胜利。

1923年 12月，黄钟瑞由一名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男二师为数不多的学生党员之一。

寒假结束，1924 年初女二师开学后，原校长辞职，燕士奇继任女二师校长。

燕士奇到任之前，就听说女二师近来局势不稳，学潮时起，他却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前任校长的无能。他自我吹嘘说“我要对付不了裙子队（指女学生）才怪哩！”

燕到任后，即开始对女二师施行高压统治。他取消了白话文课程,下令封闭图书馆,解散“读书会”“新闻社”等学生组织，停止讲演会、音乐会等各种进步活动。又以维护校风、校纪为名，命学生改穿前清服饰“不得做裤腿，不得穿裙；凡出阁者，皆梳马尾髻”。为树立个人的权威,燕士奇将原有的 20 余名教员尽数解聘，启用的新教员皆为他的私人亲信。这些人思想陈腐，无学无识“讲国文者,不知标点符号为何物;讲代数者,不晓正负号是何义；讲物理者，分子、原子说不清……”如此草包教员,开学后也只有 6 人到校。当时女二师有学生 200 多人，分 7 个班，6 个教员根本教不过来，只得连日休课放假。

燕的种种倒行逆施，使学生们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于是，公推几名学生为代表，要求校方速请教员，以免久旷学业。燕自知理亏，先是支吾搪塞，后干脆一走了之。过了几天，燕士奇回来后，以王佩珊、李培之（王若飞之妻）、韩玉蓉、王绍华等为首的几个学生代表再去找他时，谁知，他竟以“不守校规，蓄意闹事”为由，当众宣布开除这些学生代表的学籍。学生们不服，当场与燕发生争执。燕恼羞成怒，竟出言不逊。几个在场的教员也

助纣为虐，污言秽语不绝于口。致使教员、学生发生撕打。燕乘隙溜走。

愤怒的学生们忍无可忍，在王佩珊、李培之等带领下，追找燕士奇算帐。后将燕士奇逐出校门，又抢出校印，封闭财会室，学潮终于爆发。

学潮爆发后，学生中尚无统一行动的组织，都是十七八岁的女学生，不知下一步行动当如何。保定党组织立即委派黄钟瑞、张廷瑞、张辅堂到女二师指导工作，研究对策。他们到女二师后，立即组织成立了“学生自治会”，由自治会接管学校一切事务，又组织学生轮流站岗放哨，严防坏人乘机捣乱。黄钟瑞执笔起草文稿，通电全国，说明学潮真相，以争取社会各界声援。

燕士奇被驱逐出校后，接连策划阴谋，破坏女二师学生的学潮斗争。他们到处串联游说，大造舆论，诬蔑学生“行为不轨”、“聚众闹事”，并勾结直隶省教育厅张谨等人，停发了女二师的经费，企图用断绝生活来源的办法迫使学生离校。在这种情况下，黄钟瑞等根据保定党组织的指示，以“学联”名义，在保定各界募集钱粮，支援女二师学生；组织召开学联大会，发表宣言，强烈要求直隶省教育厅撤换女二师校长燕士奇，以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投书各报馆，控诉燕士奇等人的恶劣行为。

在以黄钟瑞、张廷瑞等为代表的中共保定党组织的具体指导下，历时 40 余天的女二师学潮斗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黄钟瑞因其出色的组织领导才能，被公推为“保定学生联合会”和“雪耻会”负责人。剪发斗争和这次反对燕士奇的学潮，黄钟瑞给女二师的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女学生领袖王佩珊与之建立了真挚的恋爱关系。

据保定市所存历史档案简略记载，1924 年暑期，黄钟瑞曾在家乡晋县进行过党的宣传，并且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对此，笔者曾进行过调查了解。但是，由于年代已久，知情者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已谢世，且这样的事在当时是有一定范围的，因而，详细情况不得而知。然而，黄钟瑞对中共晋县党组织的建立，特别是晋县籍在外地读书的进步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作用是可以肯定的。原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崔阶平（晋县宿村人，1929年曾任中共北京大学党组织负责人）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当时有很多青年，如同学李梦龄（晋县北张里村人，原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彭松年（晋县相邱村人，共产党员）、崔阶平等，都是在他的影响下才走上革命道路，进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1924年10月，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以武力改组内阁。保定在黄钟瑞的主持下于曹锟公园戏院内,召开了有各界群众代表3000多人参加的大会。会议的宗旨是：反对军阀统治，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

1924年末，中共保定党组织委派黄钟瑞到北京与李大钊联系，亲耳聆听了李大钊对中共保定党组织工作的指示意见。

1925年初，在黄钟瑞的影响下，王佩珊在女二师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其地主家庭彻底决裂。

1925年7月，黄钟瑞从保定直隶第二师范学校毕业，中共保定党组织特派他到北京中共北方区委党校（设在国子监）参加学习。从此，他走上了职业革命的生涯。学习结束后，黄钟瑞和王佩珊结为夫妻。

二

1925年冬，黄钟瑞奉调到唐山。其妻王佩珊则被安排到陕北榆林一所女子中学开辟党的工作。从此，夫妻二人便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了。

唐山是我国北方的重要工业区，产业工人多，有早期工人革命斗争的基础。中共唐山党组织是在李大钊、邓培等直接领导下

建立起来的北方区较早的中共地方党组织之一。自 1922 年 9 月至 1923 年 12 月，在邓培等人领导下，进行过唐山制造厂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大罢工等，使唐山工人阶级与党组织经受了考验和锻炼。中共唐山党组织是个十分坚强和富有战斗精神的党组织。

黄钟瑞到唐山后，继邓培之后任中共唐山地委书记。此时正值国民军冯玉祥部驻扎该地。在全国革命形势影响下，国民军对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运动比较同情，因而给唐山民主革命运动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中共唐山地委充分利用这种有利形势，首先抓紧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因为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的失败，曾使党组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党员群众的情绪有些低落。为了重新打开工作局面，尽快恢复党组织，黄钟瑞经常深入到工厂、矿山、学校、工人家中开展工作。唐山市新立街南头程禹民和程帝钦家是他们经常开会、学习的地方。为安全起见，有时还到野外或澡塘过组织生活。经过艰苦不懈的工作，到 1926 年上半年，唐山地区已恢复或建立起了唐山制造厂、马家沟、林西、赵各庄矿、启新水泥厂和华新纱厂等 8 个厂矿党支部。此外，还恢复、建立了各厂矿的工会组织。

1926 年初，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赵世炎到唐山检查工作，对唐山地区党的工作非常赞赏。在一间低矮的小屋中，赵世炎和黄钟瑞抵掌而谈。赵讲：唐山这个地方，有煤矿工人、铁路工人、纱厂工人……工人运动非常重要。要和工人打成一片，工作就有办法……在一起生活的两天两夜中，赵世炎高度的革命家修养、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在黄钟瑞的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隔 33 年之后的 1959 年，当黄钟瑞回忆起和赵世炎在一起的情景时，对赵的钦佩之情溢于言表，对赵说过的话仍记忆犹新。

党组织恢复之后，为鼓舞群众斗志，在开滦煤矿，黄钟瑞亲自组织领导了一次工人罢工斗争，迫使资本家基本答应了工人提出的几项条件，特别是对伤亡工人家属的抚恤全部兑现；使资本

家承认工会是工人的合法组织。

1926 年春，在英、日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直奉两系的军阀联合起来，夹击冯玉祥的国民军。日本帝国主义又制造大沽口事件，向北京军阀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军事和外交的压力下，被迫从京、津撤往南口，奉系军阀又卷土重来，占领了唐山。中共唐山党组织和工会、青年团被迫进一步转入地下活动。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决定何孟雄任中共唐山地委书记，黄钟瑞任组织部长。不到一年的时间，何孟雄调离，黄钟瑞又继续担任书记之职。

1927 年 4 月，中共北方区委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破坏，李大钊等党的领导人殉难。为了尽快恢复北方党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组建顺直省临时委员会。 6 月中旬，中共顺直临时省委在天津市成立，黄钟瑞为临时省委委员。 8 月份，黄钟瑞被调往天津，任中共天津市河北区委书记。稍后，其爱人王佩珊也从陕北榆林回到了天津，党组织将她安排在恒源纱厂，在工人中开展党的工作。

天津市河北区管辖的地方主要是从大胡同到小王庄的恒源纱厂一带，其中包括塘沽地区。党的工作重点以恒源纱厂为主。在彭真（当时化名傅茂公）的直接领导下，黄钟瑞经常深入到工厂车间同工人一起劳动，借机和他们接近，交朋友，以提高工人的思想觉悟和斗争积极性，做了大量艰苦而富有成效的工作。

1928 年 6 月，由于恒源纱厂工人田三元的叛变告密，黄钟瑞在天津市法政桥附近不幸被捕。庆幸的是黄钟瑞被捕后每次提审，叛徒田三元不仅始终没有出庭对质，而且因是天津口音，把“黄钟瑞”说成了“黄宗瑞”，而黄钟瑞此时已化名“黄桂生”。黄钟瑞争辩说：“我祖父名黄宗宪，按中国的传统，孙辈取名断无和祖父同字的道理，这是有人有意诬陷于我。”黄钟瑞被捕入狱的消息传到家乡，家人着急万分。黄父拿出全部积蓄，又变卖部分家产，

心急火燎地从乡下赶到天津，聘请律师设法营救。在“孔方兄”的鼎助下，警方才慢慢放松了查究。后来，照律师所嘱，黄父又把族谱拿到天津，警方一看，果见其祖父名“黄宗宪”，便不了了之，于 1929 年 10 月将其释放。

这次被捕，对黄钟瑞触动不小。在监狱期间，正值爱人分娩，王佩珊无人照管，整天焦虑忧愁，生下的小孩也不幸夭折。为救他出狱，家境从此败落，几个同父异母的弟妹也因此而生怨心。

也许有人会问：黄钟瑞被捕以后，为什么党组织没有出面营救呢？笔者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后，终于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1927 年 6 月中旬，中共顺直临时省委成立后，由于临时省委书记彭述之追随陈独秀，坚持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反对“八七”会议的方针，在政治上放弃对群众斗争的领导，组织上坚持家长式的命令主义，致使党员极为不满，纷纷要求改组省委，领导机构也因此一度解散。这种情况在徐彬如（1929 年 10 月继黄钟瑞之后，任中共天津市河北区委书记。建国后任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一份回忆录中也可以得到佐证：

> “……北方党的问题比较多，也比较复杂，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大革命失败后，特别是 1928 年上半年，由于北方局的领导人彭述之等犯了错误，领导机构解散，多数基层组织处于瘫痪状态，这是造成北方党比较混乱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由于闹经济问题。在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时期，北方国民党（实际是共产党在领导）的党费预算是由武汉政府提供的。大革命后期，北方有几位老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如李锡九、江浩和于树德（他们都是共产党员）等，看到国民党可能要起变化，便趁国共未分裂之机用国民党的名义把这批经费全部从银行里提出来，转到北方局的名下。北方党的经费来源过去主要依靠第三国际的支援，

大革命失败后，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被迫大大减少。因此，北方有许多地方党的经费来源发生了恐慌，有些意志不坚定的党员，在白色恐怖下发生动摇。这些人不仅组织纪律涣散，并带头闹经济问题，要求平分国民党这笔经费。彭述之作为北方党的领导人，对此问题的处理，不是从积极教育党员提高觉悟，努力克服困难入手，而是借口事关重大不敢作主为理由，进行搪塞和拖延时间。加上彭述之强调个人工作特殊，过着非常豪华的生活：他住的是高级宾馆，吃、穿任意挥霍，这就更加激起了许多地方党组织的不满，致使后来终于发生了分裂……北方党一度陷于混乱状态。”

另外，《河北党史资料》第 2 期第 83 页，也有意思基本相同的叙述。这就是黄钟瑞被捕后，党组织之所以没有出面营救的原因 。

黄钟瑞出狱后易名为“黄凝晖”，通过关系在天津市招商局谋了份儿差事，以此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0 年 6 月间，中国共产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逐步占居了统治地位。“左”倾冒险主义认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面前了”，并“有极大的可能变为全国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一爆发就会“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中国革命将会在这一最后决战中取得完全胜利。还认为：我党已经不需要逐步积聚和准备革命力量了，因为群众已经不需要小干，只要大干；在产业区或政治中心突然爆发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就可以立即通过武装起义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权，进而夺取全国所有省区的胜利。为此，党的工作，尤其是宣传鼓动工作要力争公开。

对“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思想和理论，黄钟瑞虽然有过怀疑，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党的地方领导干部，对中央的

决议只能坚决执行。1930 年 7 月下旬的一天，黄钟瑞和《庸报》一位记者（中共党员）在劝业场讲演和散发传单时再次被捕。黄钟瑞第二次被捕后，中共天津党组织曾设法进行营救，但由于这次是当场抓获，因而，营救一时未果。

三

经历了一年多的牢监生活之后，1931 年底，在天津报界同仁的多方营救下，黄钟瑞才和那位记者一同脱险出狱。这时，到了他的人生转折点。“左”倾冒险主义在他的心里罩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牺牲不可怕，但无意义的牺牲可怕，主动找牺牲更可怕。他对革命胜利感到渺茫，失去了信心，一生的悲剧就这样铸成了！

“左”倾冒险主义是黄钟瑞对革命胜利失去信心以致发生动摇的直接原因，但现实问题也是存在的。首先是糊口，找公开职业既是为工作而掩护，也是为了吃饭。两次被捕入狱，真实身份已经暴露，“带着红帽子”找工作，在当时的天津是很难办到的。其次是养家，对于那个封建包办婚姻下的旧家，他毫不留恋，然而，自 1925 年和王佩珊结婚后，为了革命工作，夫妻二人总是离多聚少，刚把家安顿下来，他又接连两次被捕……工作无着，生计乏术，家庭问题更显得突出了。

然而，这也是一条教训。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没有为了革命事业而牺牲一切的思想准备是难于继续革命的，特别是在最困难、最严峻的关头。

总之，他离开了党的怀抱，掉队了！

天津不能立足，唯有转到乡下。1932 年，他和爱人王佩珊先后在河北省庆云县立中学和栾城县乡村师范学校任教。从此，夫妻二人便开始了教书生涯。1933 年，应朋友之邀，夫妻二人又到北平求实中学任国文教师。在该校，他们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左翼教员联合会。其间， 黄钟瑞因抨击国民党反动政府，言辞“偏激”,又险遭第三次逮捕。因之失业后，他只好在京赋闲。后来，又在《众志学刊》担任了一段编辑。这项差事还是国民党河北省党部要员阎振熙与其安排的。阎和他是保定男二师的同班同学，国共合作时期又在一起工作过， 1927 年 4 月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二人自然就分道扬镳了。再次相见后，阎居然不念旧恶，给黄钟瑞谋了这份差事。直到 1935 年“何梅协定”之后，国民党南撤，《众志学刊》停刊，黄钟瑞才结束了这段编辑工作，到北平镜湖中学继续任教。

1937年 7 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学生失学，教师失业。为了生活，夫妻二人开始了四处奔波，先后到过保定、徐州、唐山等地。1940 年，黄钟瑞携妻王佩珊回到家乡晋县，但因为复杂的家庭关系，几天之后便离开了家乡，尽管发妻（恪守妇道，始终未改嫁）谅解了他和王佩珊。他们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贯穿了整个战争年代，直到解放战争胜利。

抗日战争，对于黄钟瑞来说，是一个重新投入党的怀抱的契机，他完全可以卸掉思想包袱，奔赴抗日救亡前线，但是他错失了这个契机。1940年他回到家乡时，有几个同学曾去看望他，并劝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切从头儿开始。可他认为迟了，他说：党在力量薄弱的时候，我没有坚持到底，党的力量强大了，我再去找党，人们会怎样看我呢？“面子”观念使他错失了这个契机。懊悔和内疚心理伴随了他一生。从其独生女儿的名字“黄若迟”来看，这种懊悔心理也是显而易见的。

黄钟瑞虽然离开了党，但是他对党绝无二心，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1934年，他在《众志学刊》做编辑时，同学阎振熙曾明确表示：如果同意到国民党这边来，他将安排一要职。黄钟瑞一听，愤然作色说：“这种话你不要再说了。我到这儿来时，就已经说过，不谈政治、不谈党派，你我只是同学关系，别无其他。

如果你再这样，那么我只好走了。”说得阎振熙非常尴尬。在徐州任教期间，也曾有人拉他当教育局长，被他婉言谢绝了，时间不长他就离开了这块是非之地。

1945 年抗战胜利之后，他和王佩珊又回到了北京，先后在北京师范学校和第 33 中学任教。1958 年，黄钟瑞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

随着时光的流逝，在他内心深处，无时不对自己的一念之差而愧作，但他固有的内向性格，一步步把他推向更加孤僻的境地而不能自拔。他曾对一位老友吐露心迹：我再也没有勇气见早年的战友们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很有几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及过去的同事，如彭真、徐彬如、金诚（1928 年曾任中共天津市河东区委书记。建国后，任河北省政府副主席）、王斐然等，打听他的下落。但是，黄钟瑞不仅没有主动拜访，而且还有意回避他们。在黄钟瑞心中真是“无颜见江东父老”了。他很不愿对人谈自己的过去，包括对自己的亲生女儿。

1963 年，黄钟瑞从北京第 33 中学退休。十年动乱期间，退休生活也没有使他摆脱不应有的麻烦。在“脱党等于叛党”的错误公式下，更由于他曲折、不同寻常的经历，因而被“造反派”视为从党中央揪“叛徒”的一条有希望的线索。“红卫兵”们经常突然闯进家门，连呼带喊，威逼恫吓，令其交待刘少奇、彭真、徐彬如以及他个人的“罪行”。对此，黄钟瑞表现出应有的刚直，忍着辱骂威吓，顶着压力，实事求是地提供了自己的所知，并怀着痛悔的心情，追述了自己脱离党的全部经过。最后，终于被戴上了一顶“彭真包庇下的叛徒”帽子，而被打入另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党的各项政策的端正和落实，这顶所谓“叛徒”帽子才被摘除。

1980 年 3 月 25 日，心脏病夺去了他的生命。黄钟瑞带着一种永远无法弥补的懊悔心情离开了人间，享年 78 岁。

张 兆 丰

张璧珩 李凌宇

张兆丰，又名献瑞。河北省磁县彭城镇人，生于 1890 年 1 月 12 日(清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父亲是陶瓷工匠,后为工场场主。

1905 年，张兆丰从私塾进磁县第一高小读书， 1908 年考取保定育德中学。该校是河北省同盟会领导人王励斋、李锡九、江著源创办的。张兆丰在这里学习期间接受了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并加入了同盟会。1912 年夏①在该校毕业后考入了北京大学。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无力支持继续深造，他怀着忧郁的心情回到故乡，在磁县第一高小任英语教员。在辛亥革命和以后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革命运动中，他积极支持这些革命斗争，一方面对学生进行革命宣传教育，同时到农村发展同盟会员， 1915 年 7 月,在反对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的斗争中,他组织当地同盟会员、哥老会和拳术界人物举行起义,夜袭磁县半坡村公安局分驻所,缴获枪械八支。

辛亥革命和“反袁”运动后，张兆丰投笔从戎，考进陕西督军陈树藩创办的、由同盟会员刘廷森领导的陕西陆军讲武堂学习军事，毕业后到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第四路军（司令胡景翼),先后任练习排长、副营长、副团长、总司令部参谋处少校参谋等职，后又调到第二路军（司令樊钟秀）任教练官。1919 年初，樊钟秀部脱离靖国军接受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改编，张兆丰辞职离开该部，于“五四运动”的前夕来到天津，在报社当记者。

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张兆丰投身于这场革命运动之中，在天津市学生联合会领导下的募捐队工作。由于他积极热情，善宣传鼓动，募捐工作取得显著成绩。6月5日,天津市学生联合会发起在南开中学广场召开大会，他带领印刷工人队伍参加。会后游行示威，赴省长公署请愿。队伍出发时，被军警包围，他们冲出重围走上街头，游行途中又遇大批军警阻拦，他走在队伍前列，先与军警进行说理斗争，后推开警察，继续带领队伍前进。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张兆丰认识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增强了斗争决心，更坚定地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期间，他阅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认真学习《阶级斗争》、《唯物史观评解》以及《辩证法》、《资本论入门》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不久，他参加了于方舟在天津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随后，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张兆丰从天津回到保定育德中学，在该校担任教务主任。这期间，他不仅在校内宣传马克思主义，对学生进行革命教育；还在磁县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中组织了“人生改进社”,利用寒假、暑假带领学生到工厂、农村进行革命宣传。他曾在彭城宣讲所②作过讲演，运用大量的事例指出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号召大家起来打倒他们。这一年冀南地区大旱灾，民不聊生。他积极活动，团结进步人士，利用上层关系，促使当局救济灾民。同时，他领导农民进行反对粮食出口的要粮运动，取得胜利，使当地群众得到不少利益。 至今，提到此事，群众还称赞他“和穷人是一家”。同年9月，苏联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放弃沙俄在华一切特权，提议在平等基础上缔结中苏友谊条约。他在报纸 上看到这个消息十分激动，当即找校长、国会议员郝仲青，建议他在国会提出恢复中苏邦交，并要求在校内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郝仲青断然拒绝了张兆丰的建议，两人发生激烈

冲突，使他同以郝为代表的该校保守势力的矛盾日益尖锐。后来郝仲青又参与曹锟贿选总统的卑鄙活动，张兆丰遂与郝仲青决裂，愤而辞职，离开育德中学。不久，他又回到樊钟秀的部队。这时樊钟秀已与孙中山取得联系，并支持他的革命活动。张兆丰于1923年随该部赴广东，10月进驻广州。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国共合作。张兆丰应邀列席了这次大会，并由出席大会的河北省代表于方舟、李锡九、江著源推荐担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后他们一起回天津组织省党部。1924年5月，经于方舟、江著源介绍，张兆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负责河北省的农运工作。他经常到农村，发动农民，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反对封建军阀和反苛捐杂税的斗争。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等从直系中分化出来，发动“北京政变”，建立了国民军，冯自任总司令。为了在国民军中开展工作，我们党决定派一批党员到该部队中去。张兆丰懂得军事，加之，他在国民军中朋友较多。于是，党组织委派他到国民军中开展军运工作。临行前，党的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会见了他，并对如何在国民军中进行工作做了具体指示。经李大钊介绍他还会晤了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此后，在工作中，他经常得到党的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直接领导。张兆丰对李大钊极为尊敬和关心，赠送给他一支小手枪。在那些艰苦斗争的年月中，在后来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李大钊一直把它带在身边，作为应急自卫之用，直到被捕。这支小手枪现陈列在首都博物馆。

张兆丰到国民军先后担任第三军第三混成旅参谋长和该旅第三团团长，利用职务之便和与旅长刘廷森的私人关系，积极开展

党的工作。他把第一团团长孙金宣和第一营营长谢连铎介绍入党，以后又逐步发展了一些党员，并建立了旅支部委员会。北方区委派共产党员李林、王珪、张海如到该旅分别担任一、二、三团的副团长，负责军事训练。他还征得刘廷森的同意，办了随军干部学校，由李林任教育长，党组织还派来苏联教官。该校学员大都是山东、河南、陕西、河北的青年学生和天津、北京、郑州的失业工人。张兆丰曾亲自从天津带来由组织介绍的几十人到该校学习，在学员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建立了党的支部。这个学校为党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对以后加强党在这个部队中的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张兆丰对地方党也极为关心。部队在驻河北正定期间，他经常对正定七中学生进行革命教育，并在该校学生中发展党员。1925年春，部队经过洛阳时，他赠送当地党组织现洋 300元，为他们解决困难。

1925年夏，方振武脱离奉系，率部加入国民军，编为第五军。为了开展对该部的工作，中共北方区委指示张部与方部合作。张兆丰率第三混成旅的第三团和第五军一起，在晋北地区作战。1926年 5月在进攻应县等战斗中，他的第三团担任主攻，连克应县、阳高、东井集等城镇，同年 8 月第三团编入第五军，张兆丰因战绩卓著，升任第五军第三旅旅长。

1926年 7 月，广东革命政府出师北伐。9 月，冯玉祥在绥远举行著名的“五原誓师”，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发表宣言，声明拥护国共合作，接受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支持和配合北伐战争。冯的部队集体加入国民党，并在军内成立了国民党的最高特别党部，张兆丰被选为最高特别党部执行委员。这为他在该军开展党的工作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

1926年 10 月北伐军占领武汉。为了配合北伐军北上进取中原，冯玉祥率领国民军南下入陕。张兆丰所在的第五军编为援陕第一路军，奉命解除反动军阀刘镇华部（镇嵩军）对西安的包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